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 王利器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王利器著 王贞琼 王贞一 整理

# 王利器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周向潮 胡学彦(特约)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张谷年

## 王利器学述

王利器著 王贞琮 王贞一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125号)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杭州长风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3万

插 页 2

印 数 1-4000

版 次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64-4/G·460

定 价 16.2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王利器  
学述

治学、研究要从读书开始(代序)	1
幼承庭训及对对子	14
从吴芳吉先生攻读《淮南子》	24
《文子》与《淮南子》相辅相成	35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吕氏春秋 比义》	51
小说家言	78
关于《文镜秘府论校注》	109
《历代笑话集》序	140
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	156
我与《风俗通义》	170
读《世说新语》有瘾	176
试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 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失误	182
读《敦煌变文集》四首俗赋书 后	203
我与《文心雕龙》	218
内容博杂的《颜氏家训》	224
《盐铁论》研究	237

校讎学方法论——古书旧式	266
晓传书斋讼过录	306
访日讲学记	309
附 录	
年 表	339
主要论著目录	350
研究评介资料	355
后 记	358

## 治学、研究要从读书开始(代序)

□王利器 ○林在勇

□我是辛亥年生人，但阳历已是 1912 年，因为我的生日是在腊月。八十四了，虚岁还要加两岁。

○今天在文史哲方面卓有建树、最受景仰的老前辈，年纪和您相差都在一两岁之间，大多是 30 年代初北大、清华的几届。这在学术史上算是个人才“辈”出的有趣现象了。而在古籍校勘整理、古典文学研究注释方面，若论著作质量之精，数量之丰，像先生这样恐怕是少有的。

□这也是过誉了。

○我觉得，尽管您所做的工作，对学术研究的深入有很大帮助，许多学者会从中得益，但毕竟不是一个能够时不时地掀起“舆论轰动”的治学方向，以至于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并不以为然。也许正因为如此，您这样的治学路径能给人更多的启发。我刚念大学时，寒假前从图书馆借出一本您选注的古代笑话，作为旅途消遣，对您的了解，不少人和我一样，仅限于此。即使使用了您的其他研究成果，也不记得您的工作。

□不同的学术领域，是会有不同的特点。最近常有人

约我写学术自传，这种自传文章不好写，弄不好变成自吹自擂了。

我本来是不涉及古典小说、戏曲的，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时，主要研究先秦哲学。解放后，中宣部胡乔木、郑振铎他们发起搞十大文艺丛书，从《诗经》、《楚辞》一直到《红楼梦》、《水浒》。因为我在北大搞校勘学，乔木同志就一定要把我借调去。我参加了两个组，一是和郑振铎一起搞《水浒》，一是和浦江清一起搞杜甫诗。《水浒》搞完了，没让我回北大，留在新成立的古籍刊行社了。

○我想起曾看到一份材料，说先生最早的著作是研究《文心雕龙》的。

□是这样。过几天，北大要开《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这是一件盛事，总共邀请 80 人，内外宾各半，也请我参加。我准备作一个发言，主要是想解决刘勰提出的“文”、“笔”之分问题，这个问题从清代直到现代郭绍虞，都是越说越糊涂。

说起来，我搞《文心雕龙》，和北大还有渊源。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在胡适到任之前，傅斯年担任代理校长，他对我比较赏识，聘我到北大中文系，他让我讲校勘学。按规定每个教授要上三门课，本系两门，另外再带一个班外系的“大一国文”，这样我在中文系就又开了《文心雕龙》导读课。

当时，胡适先生是北大校长，排课很有意思，把我的课和他的《水经注》课排在同一时间，但学生还是来得很多，把教室都坐满了。班上有个英国留学生霍克斯，他经常来

和我讨论问题，后来他在沙滩寓所结婚，还请我去作证婚人。北平解放前他返回英国，不过他此后没有搞《文心雕龙》，搞《红楼梦》却很有成绩，他的《红楼梦》翻译，大概是现在国际上最好的英译本了。但是也有一个大问题，他认为红色代表危险、血腥之类，西方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所以自“怡红公子”以下，所有的“红”都改为“绿”，就连《红楼梦》也变成《绿楼梦》了。（笑）

○那么，您为什么还说他的译本是最好的呢？

□《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小说的英译本，包括我们中国自己外文局的，都是意译，不是直译，其中都存在这样那样不够准确的问题。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种“红楼”变“绿楼”，从西方人角度说，还是“信、达、雅”了。而从中国人看，“绿楼”——“青楼”，实在很滑稽。这是否说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其实是不可克服的？我们读我们的《红楼梦》，他们读他们的《青楼梦》，说是一回事，终究是两码事。“直译”的说法，严格讲也好像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说，要慎重处理两种文化的差异。

○对不起，您请继续谈《文心雕龙》吧。

□在北大我见到了所有《文心雕龙》的散本，作了研究。法国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征稿，北大就推荐了我编的《文心雕龙》讲义和周祖谟的《方言》讲义。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文心雕龙新书》，倒是巴黎大学印的，国内反而没有。此事正好是在“围城”的时候。解放后，我们把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之类外国的机构都封门了。



○也就是说，连您自己也没见到这个“法国初版本”。

(笑)

□我见到的是香港、台湾影印的，版式完全一样。港台有十多家出版社翻印，你看我手边的这一本，就是1968年的“盗印本”。(笑)我的书常常是这里出一本，他们那边“盗印”一本。

○您可以告他们“侵权”了。(笑)

□我的态度他们很喜欢，我说，你们翻印了，就是为我扩大读者影响，很好。(笑)我也不是要扬名，前些年，英国、美国什么名人传，我理都不理。

翻印有时候也有意思，你看这本宏业书局的，把我的名字都给改了，变成“王理器”了。(笑)他倒不是怕我告他“侵权”；当时的台湾当局，对出版大陆作者的书是要查问的。

○听陈鼓应先生说，台湾在五六十年代，政治高压比大陆有过之无不及。他最近刚从台湾打赢官司回来，法院裁决，为当年他们几位“台大事件”的受害者平反，连当时执行当局旨意的台大校长的荣誉头衔现在也被学校大会取消了。他把法院审理、学校讨论和媒体报道的资料照片之类，装订了几大册，似乎也很看重这次的“平反”……时代确实变化了，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我想问，像您从事这种远离现实的学问，在过去那些年里，学术上、生活上是否受到很大影响？

□70年代从干校回来，我就被勒令退休，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改为“离休”。(笑)我退休时，还不到60岁。这

也有好处，我有更多的时间由自己来支配。我出了二十多本书，别人就没这条件，做不到。

○这也是因祸得福了。

□比这更妙的事情，是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曾经写了一篇长文，谈《水浒》和农民起义。当时还没有《文学遗产》杂志，文章分两次在《光明日报》刊出，受到上面重视，还请我上天安门观礼。但过了不久就反右了，我被划成右派。（笑）二十多年后，严文井主持我的平反会，会后他告诉我，当年党委讨论时，他说我不像右派，有人就说，王利器要是不像右派，你就像右派了。

本单位反右运动结束的当天晚上，党委把我找去，对我说还空一个“指标”，就请你当右派吧。（笑）我不懂政治，也无所谓。我说，看党委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笑）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当上了右派，既没批判，也没劳改。我那时在上海还有一本书要出版，仍可以用我的真名实姓，其他右派是不行的。从前我忙透了，古籍刊行社就数我最忙，每天岂止八小时工作；经常还要往清华跑，那时路不好走。这下好了，右派可以“赋闲”，我就读了很多书。“文革”后，香港中文大学最早邀请去讲学的就是我，去过两次。事情也滑稽，他们说就是要请大陆的右派去讲学，最初每年请两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请一个。我讲的还是《〈水浒〉与农民革命》这个题目，就历史来谈多少次农民起义受到《水浒》的影响。

当右派还有个好处，“文化大革命”就不来管我了，“死老虎”早被“挂”起来了嘛。（笑）否则，批判“三名三高”，我

怎么跑得掉呢？

○像“三名三高”这种特定时代的概念，我们年轻人只能意会，不能确指了。

□针对高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嘛，谁出了书，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名气大，就要挨批。当年胡适当北大校长时，在他的名义之下，由他的英文秘书主持，我和邓广铭、周祖谟等几个人，同时给七家报纸办副刊，都是大报，《申报》、《时报》、《大公报》、《益世报》等等，一共七家。我们天天发稿，全部包下来，那时年轻啊！

○那么也请您谈谈近年的学术活动和感想。

□我最近将有一些较重要的东西出版。一是《水浒全传注》，我的注本和以往的注本有很大不同，每一条都有出处。二是《吕氏春秋注疏》，有300万字，序言有2万字，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一期发表。

中国古代文献中讲文艺理论的，最有价值的当然首推《文心雕龙》，第二就是《文镜秘府论》，以下无非是诗话、词话，不再有成系统的理论著作了。这《文镜秘府论》是唐代日本来留学的高僧弘法大师所作，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所引用的古书今多已失传。我的《文镜秘府论》校点本出版后，引起日本的注意，文部省邀请我去各个著名大学讲学，很隆重，我的女儿也陪同去了。“退休”、“离休”以后，一切外出活动，单位是不管的，都是人家请我。

○但先生还是不经常“抛头露面”的那种学者，您的“学术活动的天地”大概主要就在这书斋中吧。在一般人看

来，用力于古代文献的考订校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先生和清代的朴学家一样，不习惯或者也不屑于长篇大论、理论发挥，只是实实在在地把深厚功力花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一般人功力不到，就不识其中的妙处。您身后书架上这一排《道藏》，可以证明一个学者的深厚功力不是凭空吹出来的。

□这套《道藏》是大陆还没影印时，我从台湾买的。我几十年前在研究《颜氏家训》时就从《道藏》中得到不少参证，帮助解决了疑难。我有许多大的学术疑难是靠“二藏”中的资料找到答案的。我读书不是挑着读，而是通读。《道藏》以外，还通读了佛教的《大藏经》，这些都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事情。像我这样通读“二藏”的，国内外大概再没有别人了。

○恐怕是。好道的读《道藏》，喜佛的读《大藏经》，不太可能在两家同时用力。在我印象中，博学的钱锺书先生，主要是遍读“集部”的诗文，好像也对存世的丛书中的资料运用得很熟，较少用“二藏”的材料来参证，他的知识结构和先生还是不尽相同的。

□我早年曾经用《道藏》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化学。

○这很出人意料，虽说您现在的身份是北大历史系兼职教授，但您基本上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专家。请您谈谈。

□这方面我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所以直到最近，自然科学出版社还来向我组稿。过去世界上一般都认为结核病是德国的科学家发现的，而实际上我们在金朝就发现了，比之早 500 多年；化学在西方最早叫金银学，那一套我们在

《道藏》中很多，中国对西方化学的发展起了作用。

○这不是李约瑟他们的工作吗？我觉得他的皇皇巨著《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已经在西方世界为中国科技和文化辩了诬，赢得了荣誉。

□他的书很好，已经深入到许多不被人注意的材料，但一些问题还是嫌笼统。他的合作者中有我的同学。

○其实许多看起来才气横溢、旁征博引的著作，真正说起来，还是朴实无华，运用着最老老实实的治学方法，譬如李约瑟的书，譬如您将要出版的《水浒全传》，居然能够做到每一条都言必有据。

□做学问须有第一手材料，不能老浮在问题的表面。现在的学生，最吃亏的是总是读些通论、概论，没有深入下去。近年给我配了历史系的年轻助手，请他去图书馆借本《后汉书》都借不出来，说图书馆里没有。原来是不认得繁体字。不认得繁体字，怎么搞文史研究呢？现在大学的教育也成问题。

治文史还是要靠做卡片。我觉得年轻人要从做卡片开始积累，一天就做五张吧，一年那是多少啊！不出三五年，保证成为一个专家了。我随便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关于地震的记录非常多，像《春秋左氏传》里就不少，而说得最好的是《淮南子》，其中有一二百字写安徽巢湖，那就是个地震湖，把地震的先兆什么的都记下来了，现在巢湖不也是最深的么。我就建议把这条材料补到有关著作中去。

诸如此类的材料都可以做成卡片，分门别类，以供研究。读书时，有兴趣的，弄懂了的，要做卡片，但最重要的是

那些大家都没有弄懂的,更应当做成卡片。这次不懂,以后读别的书,会接二连三地碰到有关的内容,前后联系起来,就可能解决某个学术疑案。千万不要记在笔记本上,时间一长,本子多了,越记越糊涂,难以归类和使用。卡片的优点就是好驾驭。

○我现在使用电脑,其中也有卡片功能。即使不做成卡片形式,电脑检索和调用也还是很方便。我说这话,不是反对您的说法,是说如今我们很幸运有了电脑这种工具。但书还是要自己读,心得和疑问也是自己的事,电脑目前还不可能代替学者进行个人专业上的学术积累,所以治学的根本精神还是您说的那样。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前辈徐中玉先生,他是上海作协的主席,好像就被称为“卡片大王”,据说有几万张。您的学术卡片大概也不下此数吧?

□这事最让我伤心了,“文化大革命”,我损失最大的就是我的卡片。抄家抄去3万册图书,“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1万册。其他好多古董、硬木家具,都拿去不还了。我问卡片还在不在,回答说我们不要你的卡片,我听了很高兴。再问,说早就送到造纸厂去了。我当场就哭了,多少年的功夫呀,我是每天都做卡片的。假如这些卡片还在,我可以再做多少工作啊!

○刚才您讲到被打成右派和被勒令退休的时候,听起来您仿佛很逍遥自在。原来这只是您个人的达观态度,从遭遇上说,您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大冲击。

□抄家的时候也游过一次街。他们知道我的藏书好,就来抄。江青在她挑去的每一本书上,都盖了私章。

○为了附庸风雅，她也受累啦！

□她把这么大的“江青藏书之印”盖在我的印章上面。你看，她还竟然把章盖到蓝封面上，一点常识都没有。每一本都盖上她的名字。

○占有欲大发作，但还是心虚，没底气。一面是所谓“破四旧”，一面又故弄风雅，真是咄咄怪事。

□康生更无聊，他加盖名章还不算，你看，居然还盖上“天下为公”的闲章。

○这哪是无聊，简直是无耻！

□天下为公了，都是他的了。

○这件事应当公诸天下，古代藏书家的遭遇还没有如此离奇呢。如今往往说乾隆修“四库”是别有用心，但他至少对入选书做到用完了物归原主；他还几次三番告诫下面不要借征集图书而扰民，关照在总目里要记载藏书家名字作为对稽古藏书的鼓励；他在发还那些入选书时，亲自题诗盖章，目的也是让藏书之家世代保存，作为荣耀（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附录“圣谕”）。

□是这样，话很难说了。

○您书房墙上这几幅拓片，就是劫后幸存的文物吧？

□这是“三体石经”，曹魏时的碑刻，每个字都用三种字体对照，很珍贵。古董商为了便于偷运出去，把它砸断了。我这个拓片是刚出土时所拓，是完整的。

○是不是有三句话可以说，学者第一条就是爱书，其次是在图书馆还不便利的情况下还要有自己的特别藏书，第三句话是，爱什么样的书就成为什么样的学者。我想请

问先生，您何以能有这么多珍贵的古籍，以至于让那些人眼红呢？

□我把钱都用来买书了。解放前，我的教授工资每月370多个大洋。什么概念呢？北大的工友是每月10个大洋，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的工资三个月就可以买一部汽车。当时发的是纸币，但全北平发工资第一家是北大，给予了特殊照顾，清华排在第二，隔天发。清华在海淀，当天进不了城，不能马上到东单的市场上把法币换成大洋、金条、美元，就比北大吃些亏。法币天天贬值，但国民党也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每月公布物价指数，相应地提高薪水，水涨船高，实际收入水平影响不太大，总还能换300多个大洋。工资高，稿费也多。解放初期，我第一次出版《水浒全传》校注本，稿费是1亿，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万元。什么概念呢？有人劝我买房子，引我去看一个宅院，有30多间房，要价才3000多元。

抗战胜利后在北平，为了买《世说新语》日本影印的宋刻本，这是国内唯一的一部，我托张政烺先生千方百计去联系，最后用10两一根的金条成交。许多书商知道我爱书，都三天两头把书送到我家让我挑选，是珍本我就留下。现在看不到书啦，看到也买不起，更大的问题是书没地方放，没有房子啊。（笑）我们以前住东四十条，那里原是和硕亲王府，就是启功先生祖先的王府，楼台亭阁，分成13个小院。北大用来做教授的宿舍，一家住一个院子，向达、金克木等先生，还有刘少奇前妻、吴晗的妹夫，都是邻居。我的院子有七间房，书就摆了满满三间。现在如果三间都摆上



书,人住到哪里呢?(笑)

○这不就变成说做学问取决于经济待遇了吗?(笑)

□我和钱财也发生过几个故事。国民党时期第一次搞各大学毕业会考时,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得了状元,各报都登了,宣传得很厉害。奖金据说高得很,但我已经离开四川到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三年后朋友替我代领,贬值了,只够买只砚台。假如当初拿到钱,肯定会在老家买田地,就成了“大地主”了,解放后也没什么好处。(笑)

还有一次,重庆有个财阀、大银行家,请我用骈文写篇寿序,报酬相当丰厚。同学在江津办创业银号,知道我有笔巨款,就全部拿去了,让我作股东。第二年,我的老师、川大历史系主任去世了。川大也是岂有此理,只多发一个月工资,别的不管。打电报叫我去。因为抗战,川大迁到峨眉山。我把老师的灵柩从峨眉山运回巴县乡下,多发的一月工资刚够雇一只船。路途很远,川江枯水天很险,一路是险滩。到江津上岸,后边的路程费用更大。14挑书要用14个挑夫;灵柩需要8个人抬,分两班就是16个人;乡下小路不好走,要有人抬跳板、扛锄头开路。我就从创业银号把钱提出来用上。这事我从来没提过。要是我还当这股东,解放后也没法交代,成了“大资本家”啦。(笑)

○先生成了“大藏书家”啦,还是躲不过“文革”。(笑)学者可以仗义疏财,但损失两万册图书肯定心有不甘。

□从北平解放到四川解放,中间大半年,四川的学生收不到家里寄的钱,我就帮他们出伙食费。除了花钱买书,我的书还有另一个来历。北平“围城”的时候,国民党市政